

怀念敬爱的父亲高景德

○高平



高景德校长和夫人姜慧如在二校门留影

我父亲高景德出生在陕西省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乡里上过几年小学后，13岁时外出求学，1951年赴苏联留学，1956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他一生勤奋刻苦，严谨治学，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今年是他百年诞辰，作为儿子，我撷取几件往事来怀念敬爱的父亲。

1947年春天，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父亲，由大学老师余谦六教授推荐，应聘来到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担任助教。同年我母亲姜慧如也从陕西来到了北京。1951年国家选派去苏联的留学生，由于录取人数不够，学校推荐父亲去参加考试，父亲几天前还是监考老师，现在却突然变成了考生，虽然没有时间准备，但是依靠自己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顺利被录取为第一批留苏研究生。

父亲出国不久，我家随着院系调整从城里的北京大学搬到了郊外的清华大学，

住在2区4号。有一天接到通知，父亲苏联的导师要来中国访问，准备见一见自己留学生的家属。父亲因为学业繁忙不能回国探亲，就托导师给家里带来了一些礼物。这下子可给我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父亲出国前只是助教，要抚养子女，又要赡养老人，还要资助我的叔叔和姑姑们读书，日常开支勉强应付，这次再想给我们买几件衣服作为见外宾的“礼服”是奢望。母亲没办法只好找朋友们帮助，还不懂事的我们穿着借来的衣服和皮鞋，高高兴兴地跟着母亲去见了父亲的导师，拿到了父亲带来的礼物和照片。

1954年，我叔叔也被国家派往苏联留学，正好与我父亲在同校同系学习。从遥远山村走出来的兄弟俩，在列宁格勒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真是无巧不成书。叔叔多次对我们讲述过父亲当年刻苦学习的情况，以及他用一次论文答辩，破格通过两个学位等级，成为中国留苏学生中第一个获得苏联技术科学博士的故事。

1956年，听到父亲即将回国的消息后，全家高兴极了。父亲回到北京那天，母亲很早就准备带着我们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时光飞逝，转眼已经过去五年的时间了，不知道父亲的容貌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临出家门的时候，邻居开玩笑说，你还记得你爸爸长的是个什么样子吗？听后我随口对母亲说：“妈妈，好几年不见面了，咱们要不要带上一张我爸爸的照片，可别在火车站接错了人呀。”母

亲说不用，可我还是忍不住把家里父亲的照片又认真地看了好几遍。

一列从莫斯科开来的绿皮国际列车缓缓停靠在站台上，不等列车完全停稳，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等到车门一打开，就从人群缝隙中钻进车厢里寻找到了父亲。久别重逢，我和妹妹双双扑进了父亲的怀抱，感受父亲的温暖。父亲看见我们后非常高兴，一边说着你们都长这么高了，一边依次把我们都抱了一遍，然后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走出了车厢。母亲望着父亲略显憔悴的脸庞，以为他是因为长途旅行疲劳的缘故，父亲却笑着说，不是因为路途疲劳，而是因为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前来送行的中国留学生和苏联朋友非常热情，不少人过来跟他喝酒拥抱告别，很少喝酒的父亲盛情难却，喝了不少伏特加，以致登上火车后倒头就睡，许久后醒来还是头晕脑胀。父亲后来曾几次说过，这是他唯一喝醉的一次，也是难忘的一次。

父亲34岁来到清华，成为电机系教授，同时担任科学研究处处长，成为清华“又红又专”和“双肩挑”的干部。我家从2区4号搬到了新林院1号居住，不久又搬到了胜因院24号。

胜因院住宅有个书房，面积不大，布局方正。向南的窗户下放着一张大大的写字台，靠墙三面都是书柜，里边摆满了父亲的英文和俄文书籍。我们经常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溜进去玩耍，尽管不认识外文，出于好奇却总是喜欢打开他的书柜翻看。等他回家了，这里立刻就成了父亲的专属“领地”，他坐在写字台前潜心学问心无旁骛，忘记应该去吃饭或者睡觉是经常的事情。有次全家人到了该吃饭时就差他一人了，就让我妹妹去书房叫他。妹妹轻轻

地推开书房的门，看见父亲端坐在那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应该好半天没有吸过了，灰白色的烟灰已经很长很长。父亲在缭绕的烟雾中，看着放在写字台上的一篇文稿凝神沉思，完全沉浸在了科学世界里。妹妹不禁在门口愣住了，父亲那种专注的神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偶有闲暇时，喜欢带着我们姐弟几个走出清华，经常去的地方是颐和园和王府井。去颐和园时我们兴高采烈，父母带着我们登上佛香阁、划船昆明湖，在公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时清华工会可以安排学校职工在龙王庙住宿，好像是要通过预约排队？有点忘记了。反正有一次轮到了我家。我们跟着父亲经过十七孔桥走到龙王庙，住宿的房间在一个院子的角落里，窗外就是昆明湖。本来想好明天继续在颐和园里玩耍，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父亲叫醒我们收拾东西，说弟弟昨天半夜突然拉肚子发烧了，要带他回家去医院看病，让我非常扫兴。而一听说要去王府井，就知道父亲肯定又要去书店买书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边上有一家北京外文书店，是北京最大一家可以阅读和购买外文原版书籍的地方。到了王府井以后，母亲带着我们逛街，父亲则自己直奔书店。可是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却总在约好的地点看不见他的踪影，我们知道他肯定还在书店里流连忘返，就坐在路边高高的台阶上，数着长安街上东来西往的汽车耐心地等待。直到华灯初上时，这才看见父亲手里拿着新买的书籍匆匆地赶过来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不能从事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了。我家也从胜因院搬到了4区1号。1969年底，父亲带着弟弟高衡离开北京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清

□ 纪念高景德校长百年诞辰

华农场劳动。这几年父亲远离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并且被“劝退”失去了党籍。这对于一个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党员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沉重打击。但是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鼓励，相信总有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1971年，父母带着弟弟从鲤鱼洲回到了北京，但父亲并没有恢复教学科研工作，而是被安排到建筑队当小工，在新林院的工地上和泥砌墙盖新林楼。我母亲原来在学校工会工作，由于工会解散了，回来后被安排在幼儿园烧锅炉。幼儿园距离工地不远，一天，母亲突然听别人说工地上刚刚有人被掉下的砖头砸中头部受伤，远远望去那个受伤的人和我父亲的身形和服饰极为相似，母亲吓坏了，担心父亲出现意外，急忙赶到工地后，才知道是别的班组有人遭遇了不幸。

说来凑巧，新林楼完工不久，我家就从4区搬到了新林3楼居住，父亲幽默地对家人说，以前在鲤鱼洲时，是住进了自己盖的茅草房，现在是住进了自己盖的砖瓦房，总算是有进步啦。

1972年，父亲结束了他短暂的“泥瓦匠”生涯，回到电机系，重新开始讲课了。可能是因为久别讲台的缘故，一天，父亲回到家后，心情非常兴奋，高兴地对家人说起了当天在课堂中发生的情景。母亲考虑到当时学生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地问父亲，你的教学方法和思路，现在的学生能接受吗？父亲非常自信地说，当然没有问题。接着又说，一个好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根据不同学生随时调整自己授课方法的能力。不论你在课堂中所要讲授的内容是什么，只要认真观察学生们在听课时的表情，就应该知道自己讲课的效果如

何了。父亲说完以后，又从方才短暂的兴奋回到了现实中，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要是专门搞纯粹理论研究的就好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凭着一支笔一本书就可以研究学问了，可是从事电机工程研究完全不一样，没有试验设备和实践条件，无法对理论进行验证，要想干点事情实在是太困难了。

当时，学校通过“开门办学”，和不少工厂建立起了联系。父亲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立即展开了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那段时间，他总是清晨就前往远在西郊的北京重型电机厂，晚上回家后，又不顾一天劳累，翻书籍，查资料，记笔记。还多次出差外地，深入到电力生产第一线去解决问题，进行理论实践。后来很多叔叔阿姨们到我家来时，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即使身处嘈杂混乱环境中，父亲不仅可以非常淡定地看书学习和思考问题，还能够在1974年时在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

1975年，有一天父亲突然问弟弟，明天想不想跟他到北京机场去看看。什么？去北京机场？弟弟听了以后十分惊奇。当时，机场可是个非常新奇的地方，弟弟说当然愿意了，又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机场呀？父亲说，他要出差，明天去机场，可以顺便带你过去开开眼界。

我父亲到外地出差通常都是坐火车，坐飞机好像还是头一次。弟弟在路上问父亲，怎么这次居然能够享受到坐飞机出差这么“奢侈”的待遇。父亲说，外地有一家电厂发生了事故，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经过几次反复，都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希望得到清华专家帮助，坐飞机是为了节省路途旅行时间，尽快到达现场解决问题。

那时，北京机场设施简陋，没有登机口，更没有廊桥，所有乘客从候机楼正对着停机坪唯一的大门出去后，步行走到飞机边的舷梯登上飞机。弟弟在候机楼门口和父亲分手后，又跑到二楼的玻璃窗前，目送父亲走向飞机。没有想到，父亲在途中不时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微笑着朝着弟弟挥手告别。当年的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他的记忆中。弟弟回家后说，虽然在路途中父亲说到的专业术语，他根本听不懂，但是看父亲在说话时轻松的神态，估计他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已是胸有成竹。当时看见父亲高兴，以为他只是因出差时能够坐上飞机的缘故，后来才逐渐体会到父亲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可以用他的知识为国家经济作出贡献的心情。

1977年，父亲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科研工作了。不久，一本四十万字的专著《串联电容引起的电动机自激》于1978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父亲为人谦虚低调，在家里也是沉默少言，很少见他高谈阔论。尽管这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学术专著，尽管这是在非常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但是很少听见他向别人，哪怕是自己家里人，说过自己写过什么著作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以后我们才了解到，十年动乱对于清华教学和科研破坏的程度难以想象，这本书是十年浩劫后当年清华仅有的学术专著。

父亲有散步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了就与母亲两人在校园里走上半个多小时。可是自从他在学校担任领导，特别是成为了校长以后，家里人发现他在散步时不再继续沿着过去二校门大礼堂等传统的路线走了，而是选择往校园偏僻的地方去。我母亲形容说：“一路上你爸拿着手电，高一

脚低一脚的，专找犄角旮旯的地方去。”开始家里人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这是为了什么。后来才发现他每次散步去的地方，不是学校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就是刚从校外的水磨、大石桥等地方征用过来的土地。不禁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利用晚上散步的时间去实地了解校园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情况。父亲在清华工作了四十多年，他热爱清华，时刻关心和思考学校的建设和未来的蓝图，早日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水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始终是父亲心中的愿景和奋斗的目标。

1996年，父亲获得了“孺子牛金奖”中的最高奖——杰出奖。由于病重他不能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颁奖仪式。这天，父亲的精神好了很多，几次问身边的护理人员现在几点了？他们回来了没有？还要我扶他艰难地站起来，双臂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站在床边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才慢慢地抬起头对我说：“我要回家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是在用最后的力气，满怀深情地与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我不敢与他对视，大脑中已是一片空白。晚上，当学校代表颁奖后把奖状和奖杯直接送到病房，大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后，都希望能够听到他说几句获奖感言，谁也没有想到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可惜呀，可惜。”五个字简短平淡，却饱含了他对于人生理想追求的感慨，也饱含了他对于科研未竟事业的遗憾，听后令人深受感动。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不在我们眼前出现，许多家长里短的小事历历在目，仿佛都发生在昨天，让我们永远无法忘记。

2022年2月28日